



整体论与还原论

——认识事物的“宽”“窄”之道

□ 胡 卫

人们认识事物有两种思维方法。一种方法是从“宽处”着眼的整体论方法。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将事物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在思考和解决问题时，将问题的全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种方法是从“窄处”着眼的还原论方法，将需要认识的事物像拆卸机械钟表一样进行层层分解，先考察和认识被分解后的事物的组成部分，然后将这些对组成部分形成的认识组合起来，从而推出对事物的整体认识。这两种思维方法交织互现，共同促进，在人类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使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得以深化。我们可以将这两种认识论方法形象地概括为人类认识事物的“宽”“窄”之道。

整体论的思想古已有之。《易经》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卦和爻反映出古人对事物发展变化的整体性认识。古代的五行学说则认为，“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五种元素相生相克，推动事物的发生发展，实现事物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协调和平衡。道家的“道”是一个终极实在的概念，它既是形上本体，又是人生的法则。道家把客观世界看成是一个万物一体的整体。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整体大于它的各个部分总和”的著名论断。他主张，整体先于部分而存在，有目的然后才有目的实现；没有整体，我们就不能理解部分。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古代的整体论都是朴素的整体论，都具有其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古代的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古代的整体论大多停留在抽象的思辨层次，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笼统的猜测和虚无缥缈的循环，缺少科学理论的支撑。整

体与局部被割裂开来，整体无法被还原到更精细的局部，微观层面的局部问题则被忽视掉，失去对部分的细化，也就更谈不上研究认识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因此，一旦涉及到具体问题和事物，一旦需要使用具体的工具和方法的时候，朴素的整体论便进入了只有“直观和描述”的死胡同。可以说，朴素的整体论方法虽然是从“宽”处着眼，但容易导致“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还原论方法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著名代表人物是德漠克利特。他认为，原子是不可再分的物质微粒，万物都由原子和虚空构成。这一将事物细分为原子来认识事物的思想，经过转化和发展，在17世纪的欧洲形成了系统的还原论。17世纪还原论的代表人物笛卡尔在《方法论》一书中鲜明地提出了还原论方法的基本原则：“把我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地分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适于加以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

人们经常用“盲人摸象”来比喻一些人在观察和认识事物时，只看到事物的一部分，而看不到事物的整体，无法全面和真实地了解事物。笛卡尔所主张的还原论方法，就类似于“盲人摸象”。不过，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性的。盲人之所以采取摸象的方法，是因为其认识大象的能力受限，只有采用摸象的方法才能够获得对象的认知。在近代，落后的实验手段和观测仪器导致了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不足，科学家们只能采用“盲人摸象”的方法将自然整体进行“分割”后，先对每一个局部进行认识，然后再将这些认识组合起来。

因此，还原论是一种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认识方法论。它大大推动了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当今人类所取得的大量的自然科学成果仍然是建立在还原论的基础上的。以牛顿力学的建立为

标志，自然科学进入了一个辉煌的发展时期，还原论方法从物理学向化学、生物学甚至社会科学不断渗透。化学原子—分子学说、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原理等科学原理无不以还原论方法为基础。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还原论逐步获得了主导地位，成为了一种观察认识事物的思维定势。

还原论者追求世界背后最微小最终极的部分，认为只要时间足够，世界上未知的领域最终都能够被还原为可知的部分，没有什么还原论不能够解决的。高级的复杂运动被还原为低级运动，生物学规律被还原为分子水平的运动规律，进而又被还原为物理—化学过程。世界也被还原成为由类似于“宇宙之砖”的基本粒子所构成的世界，事物的运动发展被视为微粒的分与合。这种思维方式把事物分割之后获得了认识，但是当把这些碎片化的认识进行“组合”之后，这些“组合”后的认识有时候却无法准确地反映事物的整体性质。特别是面对复杂性程度较高的事物时，还原论方法表现出明显的狭隘性。生物学家贝塔朗菲说：“当我对生命中的各个分子都了解清楚时，我对生物的整体图像反而模糊了。”可以说，还原论方法从“窄”处着眼，容易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人们观察和认识事物可以从“宽处”的整体开始，也可以从“窄处”的局部开始，但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不能走极端，不能把认识仅仅停留在整体层次，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局部层次，要做到“既见森林，又见树木”，将对事物的认识在整体和局部的各个层次联结起来，实现“宽”和“窄”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为现代整体论提供了哲学基础。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不断运动变化的统一整体，这从总体上揭示了世界的辩证性质，揭示

了整体和局部的辩证关系；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各个范畴，又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世界辩证性质的内涵和外延。

从20世纪初开始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整体论蓬勃发展起来。20世纪20年代，强调以整体的动力结构来研究心理现象的格式塔心理学的建立为以整体论为基础的认识论提供了心理学支撑。同一时期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提出了生物有机体的概念，强调只有把有机体当做一个整体研究，才能发现不同层次上有机体的组织原理。二战之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早期系统科学理论逐步形成，这使得整体论的方法不仅仅停留在思辨的哲学层次，而是进一步延展到科学层次，有了与之直接相关的科学理论。同一时期，运筹学、信息学、管理学的发展，促成了系统工程方法和系统分析方法的形成。这又使整体论方法在工程和技术领域得到了支撑和应用。

这些学科相互渗透融合，构成了整体论方法从哲学到科学，再到工程技术各个层面的完整图景。20世纪70年代开始，自组织理论和复杂性科学的兴起进一步推进了整体论的发展。1999年4月2日《科学》杂志邀请了物理、化学、生物、经济、生态、神经科学等方面的科学家撰写文章介绍各自领域关于复杂系统的研究进展。这期名为“复杂系统”专辑的前言的标题为《超越还原论》。这说明，用科学的整体论方法认识和研究事物已经开始形成趋势。

现代系统论不是用空洞的整体论来反对刻板的还原论，而是把系统的整体性和局部的具体性有机结合，实现了整体论和还原论、“宽”和“窄”两个层面的辩证统一。它以新的方式丰富和深化了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普遍原理的具体化和科学化。

宽与严，对立统一，极富中国智慧。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应时局、察时变，于治国的大道中精微地拿捏着宽与严之间的平衡。得当者，化于成功经验，于今日仍能启迪世人。失当者，亦有深刻教训，当下看来仍发人深省。在中国的史籍书林之中，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而宽与严恰是一个十分必要的视角，帮助我们立足当下、面向未来，透过历史的纷繁汲取传统智慧的滋养。

首先，在中国历史上，在国家各项政策的决策过程之中宽严智慧有充分体现。

一是宽严要顺势。孟子曾经引用过齐国的一句谚语：“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势是事物潜在的发展倾向，必须认真审视乃至影响它，以使其朝着有利于我的趋势发展。《孙子兵法》用激流来比喻势，当其盛大时，可以挟砾石以俱下，它又好比张开的巨弩，潜藏着巨大的力量。因此对势必须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仍然讲因势而变、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诸葛亮治理蜀国的成功经验被后人总结为：“能攻心则反侧自销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诸葛亮成功治蜀的奥妙就在于先审势后宽严。政策是关系到千百万人切身利益的、甚至可能是关系到老百姓生死的大事。政策执行的标准是宽还是严，不能随心所欲，必须依据具体的情势反复权衡。换句话说，政策决策的前提是审势，要根据情势的变化，实行相应的宽严政策偏好。如果不审势就草率决策，无论是宽还是严都会导致失误。

二是宽严须平衡。一阴一阳谓之道。中国人历来讲求平衡、中庸、和谐。在政策执行问题上也是如此，注重宽严的平衡。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对待政策的宽严问题上大致有两种主张。宽是儒家和道家治国之道的总体特征。儒家讲“仁政”，讲“王道”。道家讲“无为而治”，讲“治大国如烹小鲜”，治理大国要像煮小鱼一样。煮小鱼，不能多加搅动，多搅则易烂。法家治国之道的总体特征是严，法家讲“霸道”，人民甚至用严刑峻法来指代法家思想。从表面上看，历代统治者青睐以宽松为主要特征的治国之道，儒家思想，大体上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据主流。以严为特征的法家思想似乎是作为反面教材而存在。实际上，历代的统治者并不排斥法家思想，毛泽东同志“百代犹行秦政法”诗句就是对国封建社会儒表法里的深刻洞见。从汉武帝时开始确立，汉宣帝提出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主张宽的王道和严的霸道两者兼容并蓄、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是一种主张宽严相济、宽严平衡的治国之术。“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种宽严相济、宽严平衡、宽严互补、“霸王道相杂”的“汉家制度”，从汉宣帝以后，实际上才是后来统治者实际遵循的有效治国之术。

其次，在古代中国，决策任务执行过程同样蕴含着丰富的宽严智慧，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军队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一是执行纪律必须严。严格执行纪律是科层制系统的基本要求。纪律是刚性的约束，没有纪律作为保证，任何科层组织的决策都不会实现其预期目的。以军队为例，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按照科层制的组织编制进行管理和活动的，对纪律有着严格的要求。马克思·韦伯认为，纪律是军事的产物。纪律作为实战的基础是种种体制的母体。科层制是建立在纪律基础上的机制，就是说能够按照有利于整体所谋求的目的，严格地控制每一个行动的特性及其与其他行动的关系，使每一个人的种种行动符合于一个复杂的模式。纪律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使每个人恰如其时、恰如其地、恰如其分的行事。恩格斯曾经引用过拿破仑的论述：骑术不精但有纪律，善于配合协同作战的法国骑兵，与骑术精良、善于单兵格斗但没有纪律又不善于配合和协同作战的马木留克兵之间，“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可以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马木留克兵与一百个法国兵势均力



□ 余海岗

敌，三百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三百个马木留克兵，一千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兵”。美国学者杰弗里·帕克认为，古代世界有两个地区非常重视军队的训练和纪律，其一是古希腊，另一个就是古代中国。在古代中国，按照《周礼》记载，周代的军队编制是，五人为一伍，五伍为一两，四两为一卒，五卒为一旅，五旅为一师，五师为一军。《孙子兵法》对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概括为“五事七计”，“五事”就是道、天、地、将、法。其中的法，指的是军队的组织编制。其中的将，指的是指挥者的素质，包括智、信、仁、勇、严五个方面。

“吴官教战”是体现从严执纪重要性的著名典故。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从严治军的范例。诸葛亮为了维护军纪不惜挥泪斩马谡。岳飞的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令金军闻风丧胆，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戚继光的戚家军也以军纪严明著称。汉代抗击匈奴的飞将军李广是一个很有名的将领，但他的一生却并不得志，终其一生没有获得封侯的荣耀。李广曾经四次出击匈奴，两次因迷失道路无功而返，一次遇到匈奴主力全军覆没，另一次因与主力配合不力而被匈奴围困，在友军的相助下脱险。史书中记载，李广的军队遇到困境时往往惊慌失措，全靠李广个人的勇气鼓舞全军士气。如此不重视纪律，单靠个人魅力管理军队，“李广难封”也就不能怨天尤人了。

二是执行纪律范围应该有边界。纪律必须严格执行，但同样要避免泛化、滥用的倾向，从而导致执行纪律的范围无限度扩张。与此同时某一领域的“严”也不能机械地应用在其他领域。军队要严格执行纪律，但并不意味军队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要按照执行纪律那样严格要求。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给抗日军政大学的题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就体现了宽与严的辩证法。除去军事斗争和军事训练之外的日常生活中，允许宽一点、轻松一点、活泼一点。《孙子兵法》上说：“视士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士卒如爱子，则可与之俱死。”在军队日常生活中，将帅对士卒能像对待婴儿一样体贴，士卒就可以跟随将帅赴汤蹈火；将帅对士卒能像对待自己的爱子一样，士卒就可以与将帅同生共死。将帅面对战火硝烟的洗礼，养成刚毅的性格，但也不能总是铁石心肠。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 杨亚伟

文化自信的“宽”，体现为中华文化具有多样性来源和广泛的包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化越是自信，就越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不同的文化。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化不断吸收接纳了多种文化。早在新石器时期，黄河流域中游地区先后就有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下游地区先后就有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就有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中游

地区就有大溪文化、青龙泉文化等。这些多样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来源。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各个民族的文化也在不断融合，逐渐汇聚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各个民族的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为中华文化的不断发展提供了精神滋养。中国自古就有着“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天下”观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化广泛吸收了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推动了自身的不断发展。早在西汉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向西域传播了中华文化，也引进了西域文化成果。盛唐时期，各国使臣、留学生云集长安，促进了各国文化传入中国。明末清初，欧洲科技知识的传入，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世界文化是多元共存、相互依赖的，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都需要从其他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

文化自信的“窄”，表现为一个民族在文化上对自身的一种约束性规范和文化上的自律自省自觉、自我革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切从自身做起，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理念。我们对别人关上了门就挡住了自己的路，对别人打开了门也就需要让渡一部分自己的空间。楼宇烈先生讲，“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色是管好自己、管住自己”。我们不认同“国强必霸”，不把自己的观念、文化强加给别人，束缚别人的观念，而是主张讲信修睦，与邻为善，反对妄自尊大、恃强凌弱。

文化自信的“窄”还表现为文化自信自省。中华文化强调任何事情都要反求诸己、反躬自问。近代以来，面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和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我们通过反省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拒绝开放、固守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等问题，特别是意识到蔑视

科学技术、闭关锁国的做法严重制约了社会的进步。

文化自信的“窄”还表现为文化自信自觉。中国正在走向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更应该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发展历程和未来更应该有充分的认识。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追求。这些精神和价值追求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中轴作用，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过程中逐步演变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自信的本质和灵魂，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性问题。它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起到了统帅的作用，是一种约束，一种“窄”的表现。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

文化自信的“宽”与“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强调文化自信的“宽”而忽视文化自信的“窄”，一个民族就可能丧失其文化的中轴或主体性，而其文化的多元化过程中甚至可能会演变为文化的碎片化和文明的撕裂的过程。只强调文化自信的“窄”而忽视文化自信的“宽”，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有可能被禁锢，其文化缺少多样性的来源。长此以往，其文化发展易于形成路径依赖和近亲繁殖，出现创新发展动力不足的情况。

因此，文化自信必须是“宽”与“窄”的有机融合，在“宽”中坚持和发展文化自信的“窄”，在“窄”中不断拓展和丰富文化自信的“宽”。费孝通先生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世界各民族文化都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丰富了世界文化，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繁荣。

“各美其美”就是尊重本民族的

文化，培育和发展好本民族文化。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孕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彰显的自强不息、独立自主的精神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美人之美”就是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闭眼看世界。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以各自方式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就是要在坚持一律平等的原则下，尊重不同文化的个性和差异性，而不是独尊或贬损某一种文化。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是要推动文明的交流互鉴，丰富人类文明的色彩，让世界各国人民享受更有内涵的精神生活、开创美好未来。人类文明因各有所长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因相互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一个民族越是对自身的文化充满自信，越是能够以开放包容的胸怀、辩证取舍的态度对待不同文化，兼纳百家之精华，融会贯通各种文化之所长；越是能够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动中使其文化得到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实现文化自信“宽”“窄”的辩证统一。要实现“美美与共”，既要保持各民族文化交流差异和平等竞争的权利，又要维护文化互动交流、自由创造的权利。要实现“天下大同”，就应当以交流互鉴超越隔阂冲突，只要秉持包容精神、保持警惕，世界就不会存在“文明冲突”，就可以在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实现和谐共生。